

【跟大师学国学】

哲学

中国哲学十讲

李石岑 著



中华书局

「跟大师学国学」

中国哲学十讲

李石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十讲/李石岑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1
(跟大师学国学)

ISBN 978-7-101-10492-9

I. 中… II. 李… III. 哲学-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866 号

书 名 中国哲学十讲

著 者 李石岑

丛 书 名 跟大师学国学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92-9

定 价 25.00 元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跟大师学国学”出版缘起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次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

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写在前面

李石岑（1892—1934），湖南醴陵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学校学习。在日期间，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编发《民铎》杂志。1919年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继续主编《民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铎》杂志刊出“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进化论专号”等，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成为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刊物。1920年1月至1921年7月，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2年1月至1928年夏，兼任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主编。同时还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任兼职教授，到东南各地演讲，围绕人生问题，从教育、哲学、宗教、科学等不同层面阐述他的观点、体悟。他对西方近代哲学、心理学乃至科学无不了如指掌，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有尼采、罗素等无不信手拈来，其中又注入了他中国经验的观照与理解，使人听来趣味盎然。1928年，李石岑赴法、英、德等国考察西方哲学。在欧洲，系统研读了从赫拉克里特到费尔巴哈的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也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1932年暑假，往福建教育厅讲演中国哲学。1934年10月病逝。

李石岑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关注点在教育 and 哲学两方面，重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十讲》《人生哲学》（上卷）《希腊三大哲学家》《现代哲学小引》《哲学概论》等。

李石岑在学术研究上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的是他的中西哲学史比较，代表作就是《中国哲学十讲》。这是李石岑据其 1932 年在福建省教育厅暑期讲学会讲演稿整理而成，1935 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李石岑从哲学发展过程和哲学思想实质两方面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同异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上的比较，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此次出版，除对文字进行重新审读外，亦逐一核对引文，订正部分编校讹误，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部较高质量的读本。

自序

这是民国二十一年在福建教育厅暑期讲学会的讲演稿，承林声甫、黄君扬两君为我当场速记，后又经过一番整理，邮寄上海，这样的盛情，是使我心中感觉得很不安的。二十二年秋，担任暨南大学哲学讲座，仍取此稿掺杂讲述，内容略有更易，又承暨大学友多人为我分别笔记；如夏炎德、吴仲林、杨荣春、邱焕斌、伍嘯田诸君，均分出许多精力，为我搜集、整理、编制、誊抄，这都是应该十二分地铭谢的。尤其是大夏大学旧学友车铭深君，所出助力更大。本书第八、第九、第十各讲，几全成于车君之手。谨在此深致不忘之意。余尚当编著《中国哲学史》一书，本讲中不无粗疏之处，当于哲学史中分别补正。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石岑记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讲 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比较研究	1
第二讲 儒家的伦理观	31
第三讲 墨家的尚同说及其实践精神	63
第四讲 道家的宇宙观	97
第五讲 名家之观念论的辩证法与形式论理	131
第六讲 《中庸》的哲理	167
第七讲 禅家的哲理	199
第八讲 什么是理学	231
第九讲 体用一源论	287
第十讲 生的哲学	327

第一讲 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 比较研究

此次承福建教育厅的盛意，嘱作长期讲演，并以中国哲学为题。兄弟接到这种任务的时候，心中十分愉快，同时也十分惶恐。愉快的是能和诸位聚首一堂，又能借这机会赏鉴福建的自然之美；惶恐的是中国哲学很不易谈，中国哲学比西洋哲学更难于研究，恐怕不免有许多遗误的地方。我现在把这回讲演，分作十次，名为“中国哲学十讲”。单选择中国哲学重要的部分，作一种概括的说明，希望诸位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和指教。

一、从发展过程观察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

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之史的发展过程上，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中国哲学从成长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就形式上讲，竟和西洋哲学发展的各阶段有极相同的地方。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哲学思想，在同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从形式上，从各家思想的总汇上，找到它们的一致倾向。这样，我们拿来作一回比较研究，绝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为研究便利起见，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划分为三时期。每一时期举出几个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代表，同时把它们的社会背景加以简单的说明，然后寻出它们的异同，作我们研究的指针。

第一，成长期 中国哲学成长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

西洋哲学成长期（公元前4世纪以前）

第二，嬗变期 中国哲学嬗变期（公元前3世纪至17世纪中）

西洋哲学嬗变期（公元前4世纪至17世纪初）

第三，发展期 中国哲学发展期（17世纪中至现在）

西洋哲学发展期（17世纪初至现在）

现在依次将各期哲学思想分别比较如下：

（一）第一期“成长期”的比较

中国哲学的成长期，完成在秦代以前的一个时期里，亦即完成在封建制度一个完整时期里。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建筑在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基础上。从西周以后，这种剥削关系，日甚一日，春秋战国以后，因商业资本的发达，虽然给封建制度一个打击，如自然经济的破坏，土地私有及土地买卖的促成等等，是其最显著的征象，可是封建制度并不因而破坏；

它的整然的体系即地主对农民剥削的体系,仍是存在的。这种体系不仅存在,而且更巩固一步。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要求,所以剥削的程度尚有一定的制限;及至商业资本发展以后,地主的奢侈的欲望,无形中一天一天地增高,因之对农民的剥削遂一天一天地加重。这不是剥削的体系更巩固一步么?政治上的情形正复如此。所以政治上主要的力量总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就讲到从秦朝以后一直到近代的政治,又何莫不然?不过自秦以后,封建社会的形态发生多少变化而已。在秦代以前,既为封建制度的完整时期,又经过商业资本的发达,因此反映在哲学思想中,遂有维护封建和反封建的两种思想,是为中国哲学成长期的大概情势。

西洋哲学的成长期完成在亚历山大时代。那时因希腊和波斯战争,得到最大的胜利,获取了大量的奴隶,遂促成以仅仅九万的雅典市民镇压三十六万的奴隶的局面。在那种局面之下,当然形成以奴隶生产为基础的奴隶社会。而那时候的经济形态,便是奴隶劳动的农业经济。伴着奴隶生产的发展,商工业亦因而呈现相当的进步。因此反映在哲学思想中,便是立于“农业——种姓”的基础之上的旧秩序和立于“商业——货币”的基础之上的新秩序,乃至立于二者之间的折中思想。是为西洋哲学成长期的大概情势。西洋哲学成长期的社会背景是奴隶制度,中国哲学成长期的社会背景是封建制度,这两种社会背景本质上虽不同,但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剥削一点是相同的,因此,反映在思想上,正决定两个相同的倾向。

以上是把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以概括的说明,现在举出几派重要的哲学思想作一比较。

1. 儒家和观念派

(A) 孔子和苏格拉底 孔子是春秋时代一个伦理学家。春秋时代是封建制度外形上开始动摇的时代,孔子是维护封建制度最热切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提供一个维护的方法。

中国封建制度有一种特色,便是以宗法制度为经,封建制度为纬,将贵族稳固地安放在农业社会之上,而组成一种严密的阶级制度。封建制度

尚不过是政治上之表面的组织，若宗法制度乃是使这种组织深入于社会内层而筑成一种牢固不拔的基础的东西。孔子为了要维护这特殊组织的封建制度，遂提出了一个“正名”。而正名定分的思想，遂成为中国社会一般生活的指针。孔子说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可见“正名”在孔子思想上的重要。“正名”成为一切政治、道德的基础，从这段谈话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封建社会中，“名”便是统治阶级一种绝大的精神武器，一种最有效的支配工具，一种最灵验的麻醉剂，孔子特别地提出一个“正名”，可谓善于维护封建制度者。

我们再看苏格拉底（Socrates）是怎样地维护奴隶社会。这真奇怪，他和孔子的用心一样，便提出一个“概念”。他以为事物的本质可以用概念表明，认识便是事物的概念的确定，换句话说，真正的知识便是概念的确定。因为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具有永久不变性的。苏格拉底所以提出概念，主要的在应用到道德上，因此昌言：知识即道德。意思是说知识是普遍的，是永久不变的，所以道德也是普遍的，是永久不变的。在当时希腊征服波斯以后，忽然间增加无量数的奴隶，非有一种普遍的概念以范围人心，维系社会，势必陷于溃散不可收拾之地。苏格拉底的思想本是倾向贵族政治的，故极力倡导概念的正确和知识的尊严。概念具有上抑下尊凌卑的潜力。譬如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非个别的天王皆圣明，乃概念的天王皆圣明。概念在社会上的作用，比任何物质上的权威还大。它可以入人于不觉，慑人于隐微。苏格拉底看透了这点，所以极力倡导知德一致的思想，这对于奴隶社会的维护是具有很大的功效的。

苏格拉底倡导概念的正确，孔子提出正名，这东西两圣人，在当日的

阶级制度下，是何等的用心之苦啊！孔子为对抗当时的“邪说暴行”，所以提出“正名”；苏格拉底为对抗当时的哲人派（Sophists），所以倡导概念的正确。又孔子为说明“名”的功用，所以自称“无知”，而提出“叩两端而竭焉”的方法；苏格拉底为说明概念的普遍性，所以亦自称“无知”，而提出一种“产婆法”（Maieutic Method）。这东西两圣人，在当日的复杂环境下，又是何等的用力之勤啊！可见他们的努力正有相同的特征，便是维护统治阶级的企图。

（B）孟子和柏拉图 孟子虽不是孔子的直属弟子，也不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但他的思想是承继孔子的。孟子比孔子大约晚生一世纪有半，那时封建制度外形上的动摇更加剧烈，孟子既以“学孔子”为夙愿，当然对于封建制度的维护，非加一番更大的努力不可。于是反映春秋末年封建社会的孔子正名论，到了孟子手里，便更体系化深刻化了。我们现在单从他的根本思想去检讨。

孔子当然是个观念论者，但他的观念论的思想并不如何的显明，一到了孟子手里，这观念论的本质便完全暴露无遗了。我们可以从《孟子》里面找到不少的证据，姑选几条说明。

万物皆备于我矣。

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孔子提出一个“名”，孟子便提出一个“我”，一个“心”。单就“名”说，还是知识论上的见解，若就“我”说，或就“心”说，便含有形上学的见解了。孟子想在观念论上筑成一个巩固的基础，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便是“万物皆备于我”。观念论者认宇宙万物都从“我”出发，都从“心”出发。一

切都“根于心”，而为“我固有”。这无论是柏拉图（Plato）、贝克莱（Berkeley）、马赫（Mach）、阿芬那留斯（Avenarius），都是如此。由“心”便产生理性，所谓“心之官则思”。但“心”的根原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归之于“神”了。所以《孟子》书上这样大书特书着：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所存者神。

孔子的观念论，到了孟子手里，便体系化了，深刻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得了这样一扇障壁，可以高枕无忧了。孟子的论理（按，疑应为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乃至教育哲学，都是从这种根本思想推衍出去的，暂且勒住，以后再详。

那么，柏拉图又是怎样的呢？苏格拉底提出一个概念，他便提出一个“观念”或“理念”（Idea），是把苏格拉底的概念改造而成的。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知识论，加以严密的组织，予以超越的存在，遂成为一种形上学。柏拉图认宇宙万物都是“观念”的幻影，一切都在模仿“观念”，思慕“观念”。他在《斐多》（Pheado）一部书上说：“观念之来也，则万物产生；观念之去也，则万物消灭。”“观念”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而为理性认识的对象。由于理性之知的直观，便有“观念”；由于悟性的论证，便有概念；由于感性的信念和臆测，便有万物和心像。这样，便把苏格拉底的概念论体系化、深刻化了。无论概念或“观念”都属于观念界，而观念界之至高无上的绝对者，便是神。关于神，柏拉图有单数和多数之别。因把创造主叫做永远的神，而认直接被创造的星辰和天界的灵体为诸神。这么一来，观念论者的论据充实了。在希腊的奴隶社会中，得了这么一种精神武器做支配的工具，希腊的统治阶级也可以无忧无虑了。这样看来，孟子的用心和柏拉图的用心是一致的。

观念论者的特殊本领便是将宇宙万物作一种系统的说明，但所谓系统

是心的系统，或是神的系统。就心的系统说，则观念论常变成“唯我论”（Solipsism）；就神的系统说，则观念论常变成“有神论”（Theism）。但心的系统和神的系统每每联成一气，因为要这样，才可以为统治阶级作成一个大天无缝的理论。而不幸我们的孟子和柏拉图，便成了这样的一个御用学者。

（C）荀子和亚里士多德 孔子提出一个“名”来，荀子便特别在“名”字上着力，而有《正名篇》之作。他以为“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刑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他把“名守”看得非常的重要，以为乱之所以发生，就由于不看重“名守”。他在《富国篇》里面，说得很明白：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

荀子所谓“名守”，即是“分”。有贵贱之分，有尊卑之分，推而至于美恶、厚薄、佚乐、劬劳之分；而“管分之枢要”的，便是“人君”。这是何等显明的为统治阶级作成宝塔式的阶级思想。他以为人生而有“欲”，“欲”即是“性”，我们必须化“性”起“伪”，才能发生礼义。礼与名的关系是相需为用的。正名以定分，守分则崇礼。如果礼不立，则一切纷争便无由遏止。荀子因此订出“三本”的礼。他在《礼论》上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

在特殊组织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提出礼的“三本”，而以“天地”“先祖”“君师”为主题，荀子的法术确实比孟子又进了一步。这种宝塔式的阶

级思想,无论在封建制度上或宗法制度上,无论在横的组织中或纵的组织中,都是精义入神,盛水不漏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正具有同样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便是他的形质论。他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念论作成一个实体。他以为实体非个物,亦非普遍性,乃是含藏普遍性的个物。换句话说,实体在个物生成变化之中实现自己,发展自己。他把个物的生成变化名为“运动”。而运动所以成立的原因共有四种:一、物质因;二、形式因;三、动力因;四、目的因。但二、三、四三因可以归纳为一因,即形式因。质言之,宇宙运行便由于物质和形式,即所谓形质。亚里士多德认世间没有无形式的物质,亦没有无物质的形式,二者是互为联系的。但二者的本质有不同,形式是主动的东西,物质是受动的东西。不惟如此,形式之上,还有第一形式,物质之下,还有第一物质。第一形式是最高级的东西,任对何物,不承受物质的待遇;第一物质是最低级的东西,任对何物,没有做形式的资格。我们看,亚里士多德所砌的宝塔,不会比荀子所砌的宝塔难看吧!亚里士多德想把统治阶级体系地稳固地安放在奴隶社会之中,因而造出第一形式第一物质种种名目,这并不是论理学上的游戏,而是他对奴隶社会维护的一种可怜的企图。

由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观念派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正同。这并不是偶然的暗合,而是它们的社会背景正有相同的因素。所谓相同的因素便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因此反映到哲学思想上,便有维护统治阶级的观念派和儒家。

2. 墨家、名家和主不变派

(A) 墨子和巴门尼德 墨子也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不过他和儒家所用的方法不同。他生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正是封建制度外形上日趋动摇的时候。他看到孔子从宗法思想维护封建社会,以为这种方法不适用,结果只有“靡财贫民”,“伤生害事”,非改用别一种方法不可。因此提出尚同说,以与孔子的等差说相对抗。墨子所谓尚同,乃上同于天,上同于天子。